

# 雙重文化冷戰：亞洲基金會 援助亞洲大學項目探析

• 張 楊

**摘要：**冷戰延伸至亞洲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創建了名為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的前線組織，並在亞洲推動以贏得人心為目標的多種文化活動。其中援助亞洲大學是投入力量最多、影響最為深遠的項目之一，極大促進了美國冷戰政策目標的實現。現有檔案顯示，亞洲基金會的援助項目並未完全停留在反擊共產主義這一意圖上，也非單純地用於推廣教育現代化，而是在整合當地需求和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通過「涵化」(enculturation)策略來最大限度地增強美國在知識領域的影響力。本文試圖探究亞洲基金會推動當地高等教育發展背後的動因，並傾向於認為，在冷戰和非殖民化背景下，美國在亞洲從事着兩場「文化戰爭」，一場是與中蘇社會主義陣營展開的意識形態鬥爭；另外一場則是同英國等傳統殖民力量展開的影響力競爭，其最終目的是要幫助建立和維持以美國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地區新秩序。

**關鍵詞：**亞洲基金會 現代化 涵化 文化冷戰 亞洲高等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自由國際主義外交理念和美蘇兩大陣營間的冷戰對抗，使高等教育援助成為帶有特殊意涵的戰略。在官方和私人機構的推動下，美國不斷尋求其在科學、技術、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佔有優勢的國際認同，鼓勵美國範式的現代學術體系進行海外傳播和全球複製。這一時期，亞洲殖民體系趨於徹底瓦解，新獨立國家的國族建構處於關鍵階段。大學在促進地區發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成為塑造亞洲社會未來走向的關鍵因素。援助亞洲大學項目在此背景下獲得強大的推動力，成為美國冷戰知識傳播和新世界秩序構建之國際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時，在眾多活躍於亞洲的美國官私機構中，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前身為自由亞洲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CFA])在當地高等教育領域的活動尤其值得關注。1951至1967年間，亞洲基金會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以下簡稱「中情局」)的前線組織，從事「政府樂見其成但又無法

\* 筆者誠摯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的意見，惟文責自負。本研究得到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ZD243)的資助。

親自從事的活動」<sup>①</sup>。亞洲基金會的真實身份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鮮為人知，自成立之日起就接受中情局的資助和美國國務院的總體政策指導<sup>②</sup>；1967年，《壁壘》(Ramparts)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曝光了亞洲基金會接受中情局資金的事實，引發軒然大波。它不得不轉而接受美國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USAID)的資金，轉型為「準非政府組織」(quasi-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up>③</sup>。有學者將其與中情局在歐洲資助的文化組織文化自由大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CCF)做對比，認為亞洲基金會的重要性被學術界嚴重忽視<sup>④</sup>。

事實上，自藏於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的亞洲基金會檔案(Asia Foundation Records)公開後，已經有多位學者利用這批檔案展開研究，並發表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對此，美國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歷史系教授傅葆石發表在《二十一世紀》的文章中有詳細介紹<sup>⑤</sup>。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仍有可拓展的空間，原因在於：其一，已有研究多以某一微觀個案作為切入點，或是文化出版，或是文學專刊，或是影視媒介，涉及亞洲高校體系和區域知識生產的研究尚不多見；其二，已有研究雖然承認亞洲基金會與中情局的關聯，但更傾向於認為它是接受後者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弱化了其實為美國亞洲政策直接執行者的身份<sup>⑥</sup>。因此，以援助亞洲大學項目為切入點，可以透視戰後美國力量進入亞洲的隱蔽路徑，以及其為構建新世界秩序而在知識層面作出的努力。

總體來看，冷戰前期亞洲基金會在中國周邊地區從事的教育和文化項目是以抗衡新中國影響力為主要目標，但在難以計數的項目和活動中，又不難看到美國長久以來試圖重塑亞洲國家的傳統理想。1960年代以後，美國愈益明確地推動當地高等教育現代化，藉以促進美國文化和觀念的廣泛接受。在此過程中，美國面臨多重困境，因此不得不採取深度隱蔽和文化「涵化」(enculturation)的策略，作為實現目標的方案。亞洲基金會在亞洲高等教育領域的活動，一方面折射出美國深受冷戰思維影響的對抗式政策取向，另一方面亦可揭示美國欲以自身發展模式為參照，在知識領域重構地區秩序的努力。在此過程中，美國遭遇的抵制和抗衡不僅來自中蘇社會主義陣營，還來自帶有反殖反帝情緒的亞洲知識份子，以及諸如英國這樣舊世界秩序的維護者。有學者認為，冷戰時期美國事實上從事着兩場「文化戰爭」：一場是針對蘇聯集團的、在更大規模上的反共產主義世界的歷史性鬥爭；另一場是針對西歐知識與知識階層根深蒂固的反美傾向、在文明和社會層面展開的鬥爭<sup>⑦</sup>。本文試圖探究亞洲基金會推動當地高等教育發展背後的動因，認為文化冷戰的雙重特徵在亞洲同樣顯著。或言之，包括亞洲基金會在內的美國官私機構，在亞洲亦從事着雙重文化冷戰，其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以美國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地區新秩序。

## 一 反共與重建：援助亞洲大學項目的緣起

1951年2月，美國中情局政策協調辦公室(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和隱蔽協調委員會(Covert Coordination Committee)批准以自由歐洲委員會(Free

Europe Committee) 為樣板成立「自由亞洲委員會」，致力於在亞洲從事隱蔽行動，項目代號為“DTPILLAR”，並於三年後更名為「亞洲基金會」<sup>⑧</sup>。作為一個大型隱蔽項目，成立之初的亞洲基金會總體目標是反共，即「向亞洲人提供更多機會，使其通過自身努力和民主手段實現合法目標，從而抵消共產主義的吸引力」<sup>⑨</sup>。與此同時，它明確在亞洲的使命是長期的，以促進亞洲各國私人機構數量增長為要務，並且借鑒美國慈善基金會「助人自助」的一般原則，力求在亞洲當地培育「民主」機制，使其逐漸獲得自我成長的能力。或言之，「鼓勵和支持亞洲個人和組織，加強其自由社會和自由制度的發展」<sup>⑩</sup>。從現已公開的檔案來看，亞洲基金會在中國周邊地區有着異常廣泛的活動譜系，涉及亞洲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個領域。然而，其關注的重點領域始終是亞洲高等教育，並為此進行了持之以恆的努力<sup>⑪</sup>。

創設之初，亞洲基金會在亞洲高等教育領域的活動，主要為消除新中國的影響。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批知識份子湧入香港，以教育、出版和文化事業為生計。他們在香港成立數所中文書院，在華人世界影響甚巨。新中國成立亦引發了東南亞華人學生的求學難題。歷史上，由於東南亞國家缺少高等教育資源，華人學生一般會回到中國大陸求學。冷戰背景下，東南亞華人學生的求學意願被演繹成為「用腳投票」的人心向背之爭。蓋源於此，中情局給亞洲基金會的首個政策指南就是「培養與美國友好的、能夠在與中國大陸共產主義的對抗中聯絡並最終對海外華人產生影響的領袖」；「使〔華人〕領袖人物、專業人士和其他主要人員遠離共產主義」；「盡可能幫助那些無家可歸的重要華人重新安置」<sup>⑫</sup>。

美國政府非常清楚，「一個國家的制度或教育或許是涉及文化和國家威信的最為敏感的領域」，「它耗時甚巨，有時是幾年的時間，才能與當地教育者建立起互信，也才能與其合作，有效推進美國在當地的教育項目」<sup>⑬</sup>。因此，亞洲基金會以「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形象出現，起到官方宣傳無法替代的作用。1952年9月，亞洲基金會設立孟氏教育援助項目，組建孟氏委員會（後更名為「孟氏教育基金會」，Mencius Educational Foundation），對香港的數所中文書院進行全方位的援助，通過學生獎學金、講座教授項目、圖書與圖書館項目、學生宿舍項目、教師和學生交流項目、教科書項目等，很快令處於窘境中文書院穩定下來<sup>⑭</sup>。參與援助中文書院的還有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基督教青年會、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 ARCI）等諸多私人機構，但亞洲基金會在其中的引導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孟氏項目應該可以算作美國在亞洲的首個大學冷戰行動，亞洲基金會內部文件稱之為「隱形大學」（invisible university）<sup>⑮</sup>。其後，一篇報導更為直接地宣稱「隱形大學」是「在亞洲反擊共產主義的最新武器」，是在東南亞地區對共產主義展開直接回擊的致命行動<sup>⑯</sup>。

資助「隱形大學」的結果令人鼓舞，但美國政府認識到，充實高等教育設施固然意義重大，更重要的還是能否避免共產主義在這些大學發揮重要的知識影響。美國政府轄下的行動協調委員會（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OCB）的一份備忘錄，顯露出美國官員對文化冷戰的擔憂。這份由計劃協調小組（Planning Coordination Group, PCG）<sup>⑰</sup>執行秘書帕克（Theodore W. Parker）起草的文件強調，「在日本和部分東南亞地區的學術機構中，它們〔共產主義〕

及左翼社會主義者的影響力相當大，幾乎佔據主導地位。即使在那些共產主義影響力很弱的地區，馬克思主義哲學亦在歷史、資本主義理論和帝國主義詮釋中被廣泛應用，反西方態度非常普遍」<sup>18</sup>。對此，作為前線機構的亞洲基金會感受更深。當地代表發現東南亞華人院校普遍受到中國政府的教育政策引導，「一直是連結海外華人與中國本土的紐帶」<sup>19</sup>。新加坡南洋大學籌建時期，美國就一度懷疑這所華文大學會被共產主義左右。為了使包括南洋大學在內的東南亞華人院校「擺脫」共產主義影響，亞洲基金會和美國新聞處(USIS)投入大量精力出版華文教材，目的是在華人院校「排擠掉共產黨的教材」；僱用反共教師，引導海外華人群體的非共產主義傾向；用各種方式宣揚美國和「自由世界」經濟、軍事力量增長以及文化成就，同時想盡辦法「揭露」紅色中國，宣揚「自由中國」(台灣)的成就<sup>20</sup>。到1950年代中期，亞洲基金會以台港和東南亞華人為目標的項目經費每年約為65萬美元，其中香港華人項目佔76%<sup>21</sup>；而在亞洲基金會全部國別項目中，有34%用於華人計劃，因而開始反思在華人教育領域的投入是否比例過高<sup>22</sup>。

事實上，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亞洲的文化冷戰面對的不僅是中國問題，而是更廣泛意義上的新秩序構建問題。二戰結束後，英、法、荷殖民力量逐漸撤離亞洲，新力量要素不斷介入<sup>23</sup>。地區權力結構的變化使東南亞高等教育進入一個急劇變革時期。傳統殖民勢力的殘餘影響、新獨立民族在重建國家過程中對於族裔問題的關切，以及華人與中國大陸複雜的依存關係，都對當地教育體系構成挑戰。自冷戰在亞洲鋪展開來，美國政府不斷強調亞洲總體上處於「權力真空」<sup>24</sup>，為防止共產主義陣營滲透，美國需要將這些國家的知識精英和未來領袖拉攏到自己陣營一方。亞洲基金會主席布侖姆(Robert Blum)表示，這些新興國家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需要吸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員，而大學往往是新國家領導人的誕生地，「未來幾年內，他們會逐漸替代老去的一代西方教育背景的領導者」<sup>25</sup>。大學無疑是對一個國家施加有效影響的最為關鍵的領域，同時也是反擊共產主義的關鍵領域。

1950年代中期，美國決意幫助亞洲地區重建大學體系，以便「在知識份子群體和學術界反擊共產主義和極端反西方態度」<sup>26</sup>。關於實施方案，美國政府內部有過激烈爭論。在華文高等教育方面，OCB主張籌建「自由亞洲大學」，有兩個建議被反覆提及：一是「在每一個東南亞國家建設一所非共產主義大學以吸引華人」，二是「在太平洋地區建立一所亞洲大學，以吸引來自全世界的華人學生」<sup>27</sup>。在非華文高等教育方面，自亞洲冷戰開始後就有學者提出應當在亞洲建立一所「美國大學」；也有學者認為亞洲的情況不適合建立「美國大學」，應當將美國的資金和精力用於加強現有的亞洲學院和大學<sup>28</sup>。這些動議幾經討論，最終，在亞洲建設「自由亞洲大學」和「美國大學」的設想被認定為不現實，而「隱形大學」和「紙上亞洲大學」(Asian University on Paper)是更好的解決方案<sup>29</sup>。換言之，經過數年在亞洲的行動實踐，美國愈加意識到避免直接干預、隱身其後的重要性。這也是亞洲基金會的作用愈益重要的緣由。

所謂「隱形」，是指將反共目標與當地教育體系重建結合起來，通過擴充現有教育設施，解決亞洲當地的高等教育需求；在更理想的情況下，還要將傳播西方思想隱含於教學過程中。就亞洲基金會而言，其最為成功的行動是推動香港幾所中文書院合併成香港中文大學；重點資助越南順化大學、台灣

成功大學以及近十所基督教大學。此外，台灣、香港、菲律賓、泰國等大學在擴充規模的過程中都曾得到亞洲基金會實質上的援助。包括亞洲基金會在內的美國官私機構的援助，是戰後亞洲許多地區高等教育體系重建的核心力量。以台灣大學等六所台灣高等教育機構為例，1951至1952年，這些機構僅可接收350名海外華人學生<sup>38</sup>；1956年可接收的華人學生數量為1,400名，教師數量為100名<sup>39</sup>；再到1959年，有大約7,000名海外華人學生在台灣學習，大多來自東南亞國家<sup>40</sup>。對於日本這樣教育基礎設施較好的國家，亞洲基金會活動的重點是在高校體系清除馬克思主義思想<sup>41</sup>。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是投入3,300萬日元資助日本二十位頂尖教育家創辦「民主教育協會」(Institute for Democratic Education, IDE)，致力於研究民主教育的意義，確定民主教育的原則，並最終將其引入教育體系<sup>42</sup>。

儘管美國一再強調亞洲處於「權力真空」乃至「知識真空」狀態<sup>43</sup>，現實卻是英國在當地仍舊有着不容忽視的影響力。英美反共立場一致，但這一時期英國政府的亞洲政策總體上以維持穩定、「不引發政治上的麻煩」為重點，對在亞洲地區活動的美國機構不時發出警告<sup>44</sup>。為回應英國的關切，亞洲基金會一再保證其活動「僅限私下裏與一些有價值的團體和個人合作，支持他們的努力」，這無疑強化了各駐地代表推行「隱形」行動的策略。現有文件顯示，亞洲基金會從事的文化活動極其廣泛，但總會盡量隱於幕後，「即便實際工作主要是由美國人完成的，也要最大程度上把想法和成就歸功於亞洲人」<sup>45</sup>。

然而，英美更大的潛在衝突在於，美國在亞洲填補「知識真空」的行動，無異於排除英國在當地知識領域的影響力。舉例來說，英美都很關心亞洲院校的教材建設，擔心共產主義教科書在東南亞國家佔據壟斷地位。亞洲基金會對緬甸教科書狀況進行考察，發現當地圖書館和院校的原有書籍大多來自英國，但共產主義教科書的影響力正在快速增強。亞洲基金會確曾與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駐地官員協商，可惜後者預算有限，最終由亞洲基金會在仰光建立起教材庫，向仰光大學和大專院校的師生提供教科書和相關圖書<sup>46</sup>。仰光教材庫實際上是「亞洲學生圖書項目」的一部分。該項目下，亞洲基金會在兩年半內就向超過1,200所亞洲高校和圖書館捐贈了六十萬冊圖書；三年多後，數量達到一百五十萬冊<sup>47</sup>。美國在亞洲教材發行領域迅速獲得主導地位。在涉及高校體系發展本身的事務上，英國對美國的抵制態度更加明確。至少在1953年初，美國就從援助難民知識份子的角度，提出在香港創辦一所中文大學，遭到港英政府的堅決反對<sup>48</sup>。英美之間的類似齟齬時常見諸檔案。總體來看，英國對美國文化力量深入亞洲的態度非常微妙；英國駐地官員對亞洲基金會的活動採取了既合作又限制的消極應對策略<sup>49</sup>。不過，英美力量此消彼長的趨勢已經難以逆轉。

## 二 「美國模式」：亞洲高等教育現代化

隨着全球投射能力的增強，美國在亞洲的隱蔽行動亦迅速擴展。從一開始的香港、東京、馬尼拉、台北、吉隆坡、仰光、科倫坡、卡拉奇，到首爾、曼谷、喀布爾等地，再到印尼、印度、東南亞諸國，亞洲基金會在愈來愈

愈多城市設置了駐地代表<sup>②</sup>。儘管這些地區高等教育水平差異巨大，但對美國來說，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這些國家或地區的高等教育體系都非常脆弱，無法抵制共產主義的影響。因此，亞洲基金會早期的活動以反共、特別是遏制有着傳統地緣政治影響力的中國共產黨為行動指南。但在項目具體實施時，當地代表往往發現，「自由」的敵人不僅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還有亞洲社會和民眾的「傳統」與「落後」，而「落後」正是滋生共產主義的土壤。正因為如此，美國在高等教育領域的隱蔽行動，隱含着「現代性」的訴求，其主事者相信只有讓當地人接受現代高等教育，「才能夠對現有的思想和政策提出批判，進而提出解決自身社會問題的新思想和新方法」<sup>③</sup>。

1950年代中後期，多種因素促使美國轉向推動亞洲高等教育現代化的長期戰略。早在1954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羅斯托(Walt W. Rostow)就曾做出論斷：中國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巨大挑戰在於，「北京毫無節制地宣稱對亞洲的權力，以及自身理論和實踐對亞洲的樣板作用」<sup>④</sup>。中國自身的發展道路探索似乎也印證了美國的擔心。這一時期，美國學術界提出了多種具有諒政取向的實用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並逐漸為美國政府接受。芝加哥大學的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普林斯頓大學的哈比森(Frederick Harbison)等經濟學家研究發現，「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投資於一所大學的收益與投資於道路系統所得相差無幾」<sup>⑤</sup>。麻省理工學院的米利肯(Max F. Millikan)、羅斯托和哈佛大學的加爾布雷斯(John K. Galbraith)等人提出現代化理論，強調某些國家或地區欠發達的原因是人力資源的「傳統」特徵和社會結構的「落後」特徵。當時美國學者普遍相信存在適用於所有國家的單一發展模式，而美國的經驗可以用來借鑒，「通過將這一觀念輸出到世界上易受共產主義發展模式影響的潛在地區，美國就能夠擊敗共產主義並增強自身安全」。到1957年蘇聯衛星升空，美蘇科技競爭達到頂峰，發展中地區的道路選擇問題亦被「推向歷史舞台的中心」<sup>⑥</sup>。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共產主義提供了現代化以外的另一種發展模式，因此對「美國模式」構成巨大挑戰。

事實上，亞洲基金會很早就考慮制訂一個長遠援助規劃，並推動高等教育現代化這個援助目標的確立。1956年6月，布侖姆赴亞洲考察，在與駐地代表和英國外交人員交流後撰寫了一份報告。布侖姆認為，亞洲新獨立國家需要更多有關政治理論、憲政發展、比較政府和治理結構等方面的經驗、知識和背景<sup>⑦</sup>。隨後，亞洲基金會就未來如何展開援助進行了一系列調查，確認亞洲所謂「欠發達」地區，最為缺少的是發展所需的訓練有素的人力資源，特別是「能夠幫助培訓亞洲人的教授和專業人員」，即高等教育人才<sup>⑧</sup>。這一點逐漸成為美國政府各機構的共識，美國總體外交政策亦受影響而轉變。到1960年代初，美國對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援助政策正式出台。美國政府確認其總體政策目標是幫助這些地區實現「建設性的現代化」(constructive modernization)，而成功與否則取決於當地能否出現一批精英領袖人物。因此，美國的政策是通過人員和信息交流項目，通過鼓勵本地和外國私人機構的教育援助項目和計劃，來促進具有創新意識的群體的崛起；同時採取措施，確保這些在現代化進程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群體受到適當的外部影響<sup>⑨</sup>。

同早期在亞洲打造「隱形大學」的行動不同，進入1960年代，亞洲基金會更加關注高等教育的內容建設。時任基金會主席的威廉姆斯(Haydn Williams)

致函所有亞洲駐地代表，提醒他們亞洲國家或地區的大學極度缺乏現代社會所需的「新專業課程」，即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法學、心理學和地質學；公共管理、國際關係、商務管理、大眾傳播更是聞所未聞。所有這些新專業方向都與這些國家的發展方向息息相關，既關乎它們與美國的關係，也關乎「自由世界」反共事業的成敗。大學的社會科學教育（如國際關係教育）可以在廣度和深度兩個層面充分武裝好亞洲國家潛在的領導者，使其能夠在複雜國際關係的現實和實踐中確認並尋找國家利益<sup>50</sup>。威廉姆斯本人更強調大眾傳播學的作用，相信大眾媒體的發展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更有效應對國家成長、穩定和社會變革等問題的重要措施<sup>51</sup>。而從亞洲基金會的資助方向來看，法學教育和研究亦是其重點培育學科，因為很明顯，訓練有素的法律人員、清晰明確的法律原則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基本要素。

以推進亞洲高等教育現代化為政策依歸，「美國模式」幾乎毫無疑問成為包括亞洲基金會在內美國官私機構的共同樣板。美國以對外援助和學術交流兩種方式幫助亞洲高校發展新興學科，其中師資配置是引導學科發展的主要方式。類似的交流項目種類繁雜，難以計數。僅以1962年的活動為例，亞洲基金會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引薦一位憲法學和美國史教授，為國立首爾大學提供一位法學講師，為錫蘭大學提供一位政治學教授<sup>52</sup>。此外，它資助新加坡國立大學4.2萬美元，為其新成立的中國研究系僱用一位中國學教授<sup>53</sup>。亞洲基金會影響學科發展的另一重要方式是幫助亞洲大學僱用和引進院系部門主任。其董事會成員、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柯克（Grayson L. Kirk）就曾多次幫助亞洲院校引薦院系負責人，如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印度國際中心的研究與文化事務主任，等等<sup>54</sup>。1965年香港中文大學醞釀成立傳播學系時，亞洲基金會率先響應，並為其設立了專門基金，用來聘請一位教授和一位高級講師<sup>55</sup>。最終，就職於南伊利諾大學、畢業於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克萊頓（Charles C. Clayton）赴中大任教；他和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喻德基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項目之課程體系的設計者<sup>56</sup>。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以「密大哥大〔為〕藍本」<sup>57</sup>，可見「美國模式」影響之深。

在推動亞洲大學的「新專業課程」建設方面，亞洲基金會的思考和設計是自成體系的，致力於將學科發展與當地社會需求結合起來，使教育成為推進國家現代化的有效工具。如錫蘭在社會發展方面嚴重缺乏有經驗的公私企業管理人員，亞洲基金會遂資助錫蘭大學成立工商管理學院。對於近乎一張白紙的錫大工商管理專業而言，一位美國教授的引導效應是無法衡量的；亞洲基金會不失時機地資助聖荷塞州立大學教授克拉福德（Walter L. Crafford）到錫大擔任工商管理教授<sup>58</sup>。同樣的案例也出現在印度。印度原本有一個政府資助的大眾傳播學院，印度政府和亞洲基金會都贊同加強這一學院的專業性，並最終將其併入正規大學。亞洲基金會邀請曾擔任過記者和編輯的威斯康星大學新聞學院主任、新聞學教授納夫齊格（Ralph O. Nafziger）到這一學院擔任顧問，為期半年，指導學院的培訓工作<sup>59</sup>。1963年，柬埔寨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親王宣布結束美國對東所有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亞洲基金會卻仍舊得到允許在柬活動<sup>60</sup>；1964至1966年美柬關係惡化期間，亞洲基金會不僅如期選派經濟學教授洛朗（André Laurent）到柬埔寨皇家管理學院任教，投入1.5萬美元資助柬埔寨的合作發展培訓計劃，而且「參與到青年柬埔寨

寒人的學術發展中，為其提供研究生獎學金，共同推動美東關係的發展」<sup>60</sup>。在這裏，高等教育中的學術交流活動就成為美國外交活動的掩護色，在非常時期發揮着非常作用。

1960年代，「現代化」成為亞洲基金會教育援助項目的關鍵詞。相關檔案中揭示出來的項目數量龐大、細碎蕪雜，但始終指向亞洲大學的學科現代化、課程體系現代化、教科書現代化和圖書館現代化<sup>61</sup>。1968至1969年亞洲基金會的預算數字突顯教育相關活動的重要性：教育和人力資源發展類別項目佔總預算的24%；圖書、圖書館和出版類別項目佔21%；地區間類別項目佔24%；專業聯絡類別項目佔9%；法律與管理類別項目佔6%；志願組織類別項目佔4%；其他佔12%<sup>62</sup>。總之，無論是為適應特殊歷史情境下的反共需要，還是受美國學術思潮的推動，抑或是為因應亞洲當地的現實需求，亞洲基金會的援助目標的確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一變化並沒有脫離美國冷戰遏制戰略的主線，而是恰如其在陳述自身定位時提到的：以最適應當地需要的方式來實現美國的國家目標。布侖姆曾明確說過，對亞洲的援助只能以亞洲領導人熟悉的方式，利用當地的主動性，並朝着他們樂於接受的目標前進。如果試圖走捷徑，強迫亞洲人「採納」(adopt)而不是幫助他們「適應」(adapt)西方知識和技術，美國不僅會浪費錢財和物力，而且國際合作的良好意願也會被摧毀<sup>63</sup>。

### 三 尋找平衡點：異質文化的「涵化」策略

總體而言，冷戰前期亞洲基金會的政策目標是清晰的，並且與美國國家安全政策高度一致。解密文件顯示，亞洲基金會接受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關於亞洲的政策指令(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時期[1953-1961]是OCB)，是推進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工具<sup>64</sup>。然而深究進去，它在亞洲高等教育領域的活動又無法用遏制和反對共產主義來全盤解釋；其對亞洲社會細緻入微的觀察、對民眾教育和精神生活匱乏的救濟，特別是對亞洲社會非西方文化要素的大力扶持，長期引發學術界質疑和困惑。追根溯源，這種矛盾是西方國家在亞洲面臨的傳統難題的延續，即外來文化試圖改造當地文化卻遭遇抵制。亞洲基金會的處境更為艱難一些，因為它還同時擔負着幫助建立地區新秩序的使命。援助亞洲大學項目呈現出來的景觀正是多重因素相互博弈，進而再平衡的結果。

甫一進入亞洲，亞洲基金會代表就發現，亞洲冷戰形勢與歐洲迥然不同。1953年4月，基金會轄下的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因收聽效果不佳而面臨關閉，基金會高層承認「直接宣傳活動」已經失敗，由此在行動中更加強調要「通過推動與自由世界目標相契合的當地組織和活動來實現美國的目標」，強調不要「把預設的美國方式強加給亞洲人，或者告訴亞洲人如何反擊共產主義」<sup>65</sup>。駐地代表進而發現，亞洲民眾對諸如「自由」、「民主」這樣帶有西方色彩和政治意味的話語極為反感，自由亞洲委員會因此更名為「亞洲基金會」<sup>66</sup>。其後，它的行動變得更為謹慎。1956年起，布侖姆確定了以下原則：避免任何會使亞洲基金會的獨立性和無政治傾向受到質疑的活動和關係；在反共活動和外國組織活動不受歡迎的國家，不支持任何僅有反共目標的項



目；其目標和項目應當以促進當地社會發展的建設性的話語來陳述，而不是帶有宣傳或政治目的的消極話語<sup>⑥</sup>。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亞洲基金會採取的「隱形大學」策略，以及支持非政治性文化項目的緣由。事實上，亞洲基金會的境遇和選擇與西方傳教士初到東方傳教時類似，面對異質文化難題時兩者都採取了「涵化」策略。這裏的「涵化」借用了基督教研究中的概念：西方基督教會促進基督教在異質文化中的「涵化」，其本質是在遵從「人是天生的聖言的傾聽者」這一大前提下，提倡更為寬容的信教方式<sup>⑦</sup>。

亞洲基金會的大學項目中，有兩個看似悖論的重要文化活動：一是對中華傳統文化（儒家）的積極提倡，二是對亞洲佛教高等教育的持續支持。前面提到，亞洲基金會的長遠使命是以美國為樣板來促進亞洲的現代化，因此，其對異質文化思想和宗教的提倡就頗為令人困惑。亞洲基金會在援助台港和東南亞的大學時，意識到這些大學不僅承擔着傳授現代科學和技術的任務，而且「共產中國成立後，還承擔起保存中國文化傳統和中國研究的領導責任」，兩者不可偏廢<sup>⑧</sup>，於是採取「涵化」策略，以提倡中國文化來贏得當地華人的好感，進而推動現代化。美國對香港新亞書院及新儒家的支持已經有非常成熟的研究成果，這裏不再贅述<sup>⑨</sup>。亞洲基金會對新亞書院極為重視，1956到1961年間資助新亞書院高級研究院的數額總計達到28萬美元<sup>⑩</sup>。事實上，它在中華文化和中國研究領域的活動非常廣泛，資助了包括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研究系、香港大學現代亞洲研究所、友聯研究所、孟氏研究服務中心等機構<sup>⑪</sup>。

從宗教教育援助的角度來說，基督教大學無疑是亞洲基金會順理成章的首要援助對象。亞洲基金會重點資助過八所亞洲基督教院校，包括：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韓國延世大學、台灣東海大學、香港崇基學院、印度馬德拉斯基督教學院、菲律賓西利曼大學、印尼的沙塔亞瓦札那基督教大學和西巴基斯坦的金耐德女子學院，對所在國家的高等教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然而，處於異質文化當中的基督教大學總會面臨尷尬。例如東海大學在成立七年後的一份報告中提到台灣人對基督教大學的固有偏見，並表示「或許，要在一個民族情感不斷聚攏的非基督教社會宣揚一種基督教的行為方式，這種偏見是必須付出的代價」<sup>⑫</sup>。對亞洲基金會來說，在剛剛獲得獨立、正處於國家建構進程中的亞洲援助基督教大學，增殖效應非常有限。事實上，亞洲基金會很快發現，如何支持佛教高等教育才是必須應對的難題。

眾所周知，亞洲佛教盛行，佛教領袖在社會生活乃至國家政治中有着極強的影響力。不過，佛教領袖一般都傾向於使僧侶遠離西方文化的影響。以緬甸為例，佛陀教法協會（Buddha Sasana Council）曾表現出對增強英語教學的興趣，但不接受包括佛法杜塔學院（Dhamma dutta College）在內的佛教院校開設諸如地理、社會學、數學等課程的建議<sup>⑬</sup>。亞洲基金會一開始就重視宗教領袖的作用，每年度的預算計劃書中都會提到，要加強對亞洲宗教領袖的影響力，要對宗教領袖進行西方民主思想和實踐方面的培訓，使其認識到佛教和共產主義之間的對立，進而使佛教信眾自覺抵制共產主義的號召力<sup>⑭</sup>。

1958年，亞洲基金會開始強調「促進佛教教育機構的現代化」，其後在歷年預算計劃書的「現時目標」（Current Objectives）或「政策轉變」（Changes in Policy）列表中都會增加這一條<sup>⑮</sup>。在上述行動目標指導下的活動不勝枚舉。例如，亞洲基金會資助泰國的兩所佛教大學摩訶馬庫塔（Mahamakut Buddhist

University) 與摩訶朱拉隆功 (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發展特殊課程，以培訓僧侶擔任社區領袖，並學習與城市發展有關的實用技能。畢業後，這些僧侶在欠發達的北部和東北部鄉村展開工作。在亞洲基金會幫助下，他們建立起省級培訓中心，將其技術和領導方法傳授給其他更低級別的僧侶<sup>⑳</sup>。在越南，亞洲基金會重點培養一位名叫釋廣明 (Thich Quang Minh，音譯) 的青年僧侶，資助他到美國訪學七個月，這是越南第一次派遣一位佛教僧侶出國接受職業培訓。釋廣明回國後負責佛教青年社會文化中心的培訓項目，該中心為在西貢大學學習的外省學生提供住宿、膳食、圖書館和娛樂設施，還參與組織第一屆世界佛教青年大會<sup>㉑</sup>。與對待中華文化的態度類似，亞洲基金會對佛教高等教育的贊助有着強烈的「涵化」意味，但兩者都沒有背離促進亞洲文化現代化的既定目標。用項目專家克勞斯納 (William J. Klausner) 的話說，是否大規模資助佛教教育，最終也要取決於它們能否適應「民族構建和現代化的新需求」<sup>㉒</sup>。

作為身份複雜的「準非政府組織」，亞洲基金會承載着美國官方的使命，是官私機構間的重要連結點，更是代表美國與英國駐地代表接觸的重要渠道之一。它為各種項目提供的資助額度雖然不大，但對美國其他官私機構而言有極強的引領和導向作用。例如 1962 年亞洲基金會撥款 13 萬美元幫助日本東洋文庫成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用以加強日本對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福特基金會隨之資助 17.3 萬美元<sup>㉓</sup>；該研究中心的後續發展佐證了這一項目的成功。諸如此類，美國在亞洲教育領域的廣泛活動無疑會引起英國的警覺，遭到英國或明或暗的干預。

如前所述，有學者指出，戰後美國在歐洲從事着兩場「文化戰爭」，一場針對社會主義陣營，另一場則針對西歐知識與知識階層。英美之間的另類文化冷戰在香港表現得尤為顯著。事實上，英美之間圍繞是否創建中大、香港高校學科布局、重點支持的目標群體，以及現代高校體制等方面展開了持續的較量。時任香港教育司負責人的唐露曉 (Peter Donohue) 曾與亞洲基金會駐地人員協商說，兩個機構應當保持密切溝通，以免因利益不同而引發尷尬<sup>㉔</sup>。眾所周知，傳播學是深具美國特徵的學科。為擴大影響力，亞洲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致力於幫助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創立傳播學機構。其時，由於香港傳媒業發展迅速，社會對新聞從業者的需求增加，港英政府亦支持一些院校設立了新聞學項目，但以教授新聞採編為主。1957 年，亞洲基金會開始在香港推動建立涵蓋傳播學項目的新聞學院，但遭到親英學者的抵制。崇基學院校長凌道揚以英國沒有此先例為由，認為成立這樣一個項目並無必要<sup>㉕</sup>。然而，1965 年以後，中大和香港浸會學院還是設立了傳播學項目，其師資和資金基本來自美國。有學者認為，儘管接受度不盡相同，到 1968 年，傳播學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有了制度性的立足之地<sup>㉖</sup>。英美在亞洲高校學科布局方面的隱性較量由此可見一斑。然而，英美權勢轉移的大勢同樣體現在冷戰這一特殊時期亞洲地區高等教育的模式選擇上。包括亞洲基金會在內美國官私機構的公開和隱蔽活動，使近代以來一向由傳統殖民大國佔據影響力的亞洲高等教育領域，愈來愈顯露出「美國化」趨向。馬來西亞學者阿拉塔斯 (Syed F. Alatas) 對此批判說，美國以對外援助的方式將美國大學模式整體向海外移植，已經在印度、印尼、尼日利亞和拉丁美洲國家廣泛複製<sup>㉗</sup>。而這樣的「美國化」進程與亞洲基金會不斷平衡各方力量、尋求最佳援助方案的努力密不可分。

## 四 結論

毋庸置疑，亞洲基金會是冷戰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美國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的工具。1947年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 出台，標誌着美國不僅確認了自由國際主義外交理念，還確認了其承擔「自由世界領袖」責任的必要性。如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在講話中所說：若在此事項上動搖，「可能會危及世界和平，並肯定會危及國家福祉」<sup>①</sup>。這一新的國際身份定位本身就隱含着雙重使命，一是反擊社會主義陣營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挑戰，二是獲得世界各國對美國領袖身份的廣泛認同，或言之，「喚起外國民眾對美國及其他自由世界國家尋求實現的那種世界秩序的理解和同情」<sup>②</sup>。這是包括亞洲基金會在內的美國官私機構在亞洲援助高等教育的核心動力。

如前所述，亞洲的形勢極其特殊。亞洲基金會深知民族國家對本國教育體系的敏感、傳統中華文化對亞洲華人群體的影響，以及包括英國在內的舊殖民大國對美國勢力介入的排斥，因而採取了種種隱蔽策略。它不斷強調自己作為一個非政府組織，不謀求任何私利，所做的不過是「通過私人國際合作，加強在教育、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努力」，而這正是人類發展、進步和理解的基本需求<sup>③</sup>。除了隱蔽策略，亞洲基金會還不斷挖掘當地需求，以「涵化」策略間接實現美國的政策目標。事實上，現代化正是其時亞洲大多國家或地區的主要訴求，美國借助高等教育現代化來推動美國文化和觀念的傳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960年代末亞洲基金會遭遇重大危機，因身份曝光而面臨着被裁撤的風險，但亞洲基金會活動的重要性和策略的靈活性使其最終平穩渡過了危機。威廉姆斯在一次演講時總結道，他相信亞洲大學在促進當地發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將會成為塑造亞洲社會、歷史與未來的重要因素」，而亞洲基金會不變的職責就是發現地區和國際教育合作的新機遇，確保滿足亞洲的實際需要<sup>④</sup>。這大概就是亞洲基金會援助亞洲大學項目始終不變的動力和原則。

### 註釋

① “The Asia Foundation” (7 February 2003), CIA Records Search Tool (以下簡稱CREST), 0001088617, 2. 下引檔案如無標註，均無日期或具體頁碼。

② 從1954到1978年，亞洲基金會從美國政府得到的資金大約為1.58億美元。詳見“Briefing Paper on FY 1979 AID Funding of the Asia Foundation” (3 August 1978),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以下簡稱USDDO), www.gale.com/c/us-declassified-documents-online, CK2349515135, 1。

③ “The Asia Foundation”, 2; “Memorandu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the 303 Committee” (12 April 1967),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X,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ed. David S. Patters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1), 550.

④ Audra J. Wolfe, *Freedom's Laboratory: The Cold War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Scien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5.

⑤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9年6月號，頁48-49。

⑥ 參見Becky Shelley,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5); Grace Ai-Ling Chou, “Cultural Education as Containment of Communism: The Ambivalent Position of American NGOs in Hong Kong in the

1950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 no. 2 (2010): 3-28; Sangjoon Lee, “The Asia Foundation’s Motion-Picture Project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Asia”, *Film History* 29, no. 2 (2017): 108-37; Shuang Shen, “Empire of Information: The Asia Foundation’s Network 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al Production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Quarterly* 69, no. 3 (2017): 589-610; 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2卷第1期(2020年3月)，頁123-58。

⑦ Volker R. Berghah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 and the Intellectual Cold Wars in Europe: Shepard Stone between Philanthropy, Academy, and Diplom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xii.

⑧ Asia Foundation, “Summary of Board of Trustees Meeting” (11 February 1955), Box 590, Central Files, Asia Foundation Files, 1954-1969 (以下簡稱AFF), 1-2, Columbia University Archives; “To Approve a FY-1955 Budget for the Committee for Free Asia (Project DTPILLAR)”, DTPILLAR, www.archive.org/details/DTPILLAR, vol. 2, no. 0034, 7.

⑨ “Project DTPILLAR, IOD-2” (8 April 1955), DTPILLAR, vol. 2, no. 0029, 1.

⑩⑪⑫ “CFA Programs in Higher Education” (29 June 1954),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以下簡稱AFR), Box P-103, US & Intl Program,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R-38 & 44, 1; 2; 1,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⑬ “Coordinated Implementation of Courses of Action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Programs” (25 July 1955), RG59, Annex A, Executive Secretariat, Box 34, 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1955, National Archives II.

⑭ “Memorandum for Assistant Director for Policy Coordination, ‘Recommended Financial Plan for OPC Proprietary Project DTPILLAR’” (1 March 1951), DTPILLAR, vol. 1, no. 0097, 1-3; “The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21 December 1951), DTPILLAR, vol. 1, no. 0021.

⑮ “Report on U.S. Government Programs toward the Goal of Making English the General Common Vehicle of Communication” (1960-1961), USDDO, CK3100061359, 30c.

⑯ 筆者曾撰文論及孟氏教育基金會在香港中文大學創建過程中的作用，參見張揚：〈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當代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2期，頁91-102。

⑰ “‘The Invisible University’”, the Mencius Educational Assistance Program in Hong Kong” (1954), AFR, Box P-56, Hong Kong Organization, Menciu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General, 1951/54.

⑱ “The Invisible University” (20 March 1954), AFR, Box P-56.

⑲ PCG是OCB內部設立的臨時機構，專門負責公開和隱蔽行動的計劃協調。參見“Memorandum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Planning Coordinating Group (Rockefeller) to the Chairman of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Hoover)” (14 December 1955),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1955,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ed. Douglas Keane and Michael Warne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739-40。

⑳ T. W. Parke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an Asian University” (18 August 1955), USDDO, IWFCHC472919273, 2; “Suggested Amendments to Memorandum on Educational Facilities in the Far East”, USDDO, CK2349527030, 1.

㉑ “General Comments on Quarterly Reports: Period Ending September 30, 1956”, AFR, Box P-129, U.S. Administration, Reports Correspondence 1954-6/1962, 2.

㉒ “Draft Psychological Strategy for Southeast Asia” (9 January 1953), CREST, CIA-RDP80R01731R000700450031-6, 1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6-7 April 1953), USDDO, CK2349229971;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8 August 1954),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vol. II, pt. 2, ed. Lisle A. Rose and Neal H. Peterse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1780, 1787.

㉑ “Chinese Programs, FY 53/54 Request”, AFR, Box P-96, Overseas Chinese Administration, Budget 53/54; “Monthly Repo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12 March 1958), AFF, 37-39.

㉒㉓㉔ “To Approve a FY-1955 Budget for the Committee for Free Asia”, 2; 1-2; 7.

㉕ “Quarterly Activity Report” (1956), AFR, Box P-55, Reports, Hong Kong Administration, 8.

㉖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China Policy” (7 April 1961), USDDO, CK2349481338, 5.

㉗㉘ “From the President to All Asia Foundation Representatives, Development Paper: Education in World Affairs” (10 May 1966), AFR, Box P-246, US & Intl Program, General Development Papers, 7/62, 2.

㉙ T. W. Parke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an Asian University”, 3.

㉚ “Memorandum for Mr. David Osbor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Southeast Asia (Draft)” (21 September 1954), OCB Central Files, Box 27, OCB 091 China (File #3) (1),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以下簡稱 DDEL); “Memorandum for Members of OCB Working Groups on NSC 146/2 and NSC 5405” (7 October 1954), OCB Central Files, Box 27, OCB 091 China (File #3) (4).

㉛ Richard A. Gard, “Proposed East-West Center for University of Hawaii” (15 June 1959), AFR, Box P-130, US & Intl, Program, Social & Economic Religion Buddhism, R. Gard Consultant, May-July, 1959.

㉜ “To James L. Stewart and Harry H. Pierson, Draft Education Paper” (14 June 1954), AFR, Box P-103; “A Study,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7 February 1955), OCB Central Files, Box 27, OCB 091 China (File #4) (2).「紙上亞洲大學」與「隱形大學」意思相近，指沒有大學實體的機構接受美國的資助，以各種方式聯合起來，傳播美式教育思想。

㉝ James Van Fleet, *Report of the Van Fleet Mission to the Far East* (26 April-7 August 1954), chap. 17; “Educational Activities Relative to Korea, Formosa,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USDDO, CK2349249138, 8; OCB, “Progress Report on Activities of the OCB 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the President’s Baylor Proposals” (17 July 1957), RG 59, OCB, Box 37, Baylor Univ Proposal, National Archives II.

㉞ “Memorandum to OCB Working Group on Overseas Chinese” (13 July 1956), OCB Central Files, Box 28, OCB 091 China (File #4) (7).

㉟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Report on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SC 5723)” (15 April 1959),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CK3100231875, 14.

㊱ Asia Foundation, “Board of Trustees Annual Meeting” (10 October 1955), AFF.

㊲ Robert F. Byrnes, “A Foreign Area Fellowship Program for Foreigners” (1959), <http://fedora.dlib.indiana.edu/fedora/get/iudl:1711024/OVERVIEW>, 5-6.

㊳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27 February 1953), White House Office, NSC Staff Papers, 1953-1961, PSB Central Files Series, Box 11, Aid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 (3), DDEL.

㊴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 May 1952), AFR, Box P-57, Hong Kong Program, General; “Asian Operations Department Statement”, AFR, Box P-55.

㊵ “Summary of Status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Programs as of 12/31/52” (21 January 1953), USDDO, CK2349266315, 15; “Memorandum from James J. Dalton to the President, the Asia Foundation, ‘Books for Asian Students Program’” (8 September 1957), AFR, Box P-30, Burma 204 Program, Media Textbooks for Burmese Students, 1957, 1-2; “Burma Field Report for Period Ending 11/30/57, Books for Asian Studies”, AFR, Box P-30.

- ⑳ “Books for Asian Students”, *Science* 126, no. 3283 (1957): 1109; Carlton Lowenberg, “Books for Asi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61, no. 4 (1961): 16.
- ㉑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RCI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2 February 1953), White House Office, NSC Staff Papers, 1953-1961, PSB Central Files Series, Box 11.
- ㉒ 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3.
- ㉓ Walt W. Rostow, preface to Walt W. Rostow et al., *The 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54), viii.
- ㉔⑬⑭ “Major Directions and Fields of Interest of the Asia Foundation’s Proposed Program for 1968-69”, AFF.
- ㉕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Soft Power”, in *Soft Power and US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ed. Inderjeet Parmar and Michael Cox (London: Routledge, 2010), 70.
- ㉖ “Conference Committee on Law, the Representative-Taiwan” (5 November 1957), AFR, Box P-127, US & Intl Program, Social & Economic Law General I.
- ㉗ “Request for Project Renewal” (10 October 1960), DTPILLAR, vol. 3, no. 0033, 1.
- ㉘ “Basic National Secretary Policy” (2 August 1962), USDDO, CK2349207090, 27-28.
- ㉙ Haydn Williams, “Monthly Repo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une 1965), AFF.
- ㉚ “Request for Project Renewal” (4 December 1962), DTPILLAR, vol. 3, no. 0028, 1.
- ㉛ “Selected Projects Recently Approved” (May 1962), AFF.
- ㉜ “Letter from John F. Sullivan to Dr. Grayson L. Kirk”, AFF.
- ㉝ “Letter from Edgar N. Pike, the Representative, Hong Kong,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Asia Foundation” (9 February 1965), AFR, Box P-266, Hong Kong Program, Education Journalism Teacher Training 7/62.
- ㉞ Kenneth W. Y. Leung, Leonard Chu, and Paul S. N. Le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Hong Kong”, in *Global Trends i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ed. Kenneth W. Y. Leung, James Kenny, and Paul S. N. Lee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2006), 196.
- ㉟ 蘇鑰機：〈細說中大新傳50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網，www.com.cuhk.edu.hk/zh-TW/about/school-history。
- ㊱⑯ Haydn Williams, “Monthly Repo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August 1966), AFF.
- ㊲ “Monthly Repo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December 1963), AFF.
- ㊳ “Selected Projects Recently Approved” (February 1965), AFF; Haydn Williams, “Monthly Repo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March 1964); “Monthly Repo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September 1966), AFF.
- ㊴ 受篇幅限制，有關亞洲基金會推動教科書現代化和圖書館現代化的項目不再細述。參見“Renewal of Project DTPILLAR for FY 1966” (16 November 1965), DTPILLAR, vol. 3, no. 0014, 13; “Summary Request for Renewal” (8 January 1958), DTPILLAR, vol. 2, no. 0009, 1-2。
- ㊵ Robert Blum, “The Work of The Asia Foundation”, *Pacific Affairs* 29, no. 1 (1956): 46.
- ㊶ “Request for PP Project Renewal” (24 September 1959), DTPILLAR, vol. 3, no. 0038, 4.
- ㊷ “The Asia Foundation, Summary of Board of Trustees Meeting” (11 February 1955), AFF, 1-2.
- ㊸ Robert Blum, “The Need to Clarify Certain Policy Matters” (6 July 1956), AFF.

- ①⑨ 王新生：〈論拉納「匿名基督徒」觀念在「梵二會議」語境中的意義〉，《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頁109。
- ①⑩ “Library Notes, The Asia Foundation, No. 152” (30 December 1955), AFF.
- ①⑪ 詳見Grace Ai-Ling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76* (Leiden: Brill, 2012)。
- ①⑫ “The Asia Foundation,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ogram Bulletin” (June 1962), AFF; “Letter from W. Mallory-Browne to Mr. Robert Blum” (23 January 1961), AFR, Box P-177, Hong Kong Administration, Budget General 1960/61.
- ①⑬ 張楊：〈冷戰與亞洲中國學的初創——以費正清和亞洲基金會為個案的研究〉，《美國研究》，2018年第4期，頁128、133-34。
- ①⑭ “From William P. Fenn, General Secretary, to Board Members and Other Friends, Tunghai University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62), AFR, Box P-341, United Board U.B.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II.
- ①⑮ “From Bill Eilers to Messrs. Lasaroff, Sheeks, Bradley, and R & D Religions Man, Gard Triannual Report and Buddhist Program” (12 September 1958), AFR, Box P-130.
- ①⑯ “Summary Request for Renewal” (18 December 1956), DTPILLAR, vol. 2, no. 0017, 1; “Summary Request for Renewal” (8 January 1958), 2; “Request for PP Project Renewal” (24 September 1959), 2.
- ①⑰ “Request for PP Project Renewal” (1 December 1958), DTPILLAR, vol. 2, no. 0003, 2; “Request of Project Renewal” (27 November 1961), DTPILLAR, vol. 3, no. 0031, 1.
- ①⑱ “Selected Projects Recently Approved” (November 1965), AFF.
- ①⑲ William J. Klausner, “Program Specialist, Thailand, to the President, the Asia Foundation, Hong Kong Paper on Buddhis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30 December 1964), AFR, Box P-245, US & Intl, Program, Social & Economic Religion Buddhism II, General.
- ①⑳ 參見“Selected Projects Recently Approved” (May 1962), AFF；韓鐵：《福特基金會與美國的中國學(1950-1979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261。
- ㉑ “Memorandum to the Record, ‘Conversation with the Hon. Peter Donohue, Director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5 June 1962), AFR, Box P-171, Hong Kong Program, Education General.
- ㉒ L. Z. Yuan,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Hong Kong” (3 September 1963), AFR, Box P-266.
- ㉓ Wolfgang Donsbach,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768-69.
- ㉔ Syed F. Alatas, “Academic Dependenc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Reflections on India and Malaysia”,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38, no. 2 (2000): 86-88.
- ㉕ Harry S. Truman, “Recommendation for Assistance to Greece and Turkey” (12 March 1947), [www.trumanlibrary.gov/library/research-files/address-president-congress-recommending-assistance-greece-and-turkey](http://www.trumanlibrary.gov/library/research-files/address-president-congress-recommending-assistance-greece-and-turkey).
- ㉖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30 June 1953),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vol. II, pt. 2, 1836.
- ㉗ “Statement of Basic Purpose, Tenets, and Program Philosophy” (1 February 1967), AFF.
- ㉘ Harry H. Pierson, “University Cooperation and Asia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Hong Kong, Program Quarterly” (March 1967), AFF.